

通识

大学通识教育教材

大学国文

顾问 甘阳 吕正惠

重庆大学《大学国文》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大学通识教育教材

大学国文

顾问 甘阳 吕正惠

重庆大学《大学国文》编写组

主 编 刘扬

副主编 袁敏 万曼璐

编写组成员

彭文良	万曼璐	刘扬	袁敏	刘书刚
金浪	李广益	吴娇	万曼璐	袁敏
张华	彭磊			
廖涵	钱锋			

DAXUE GUOWEN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内容提要

本书是大学通识教育教材。

本书致力于帮助非中文专业的学生构建关于中国古典文明的知识体系，涵纳了先秦诸子思想和文化、汉魏六朝诗文传统、唐宋诗词文赋以及元明清市民文学经典。本书既重视学习内容的文学性，又兼顾古典文明的思想性，在东西文明大视野的比照下，以考古中国为视点，凸显中华古典文明的完整性和独特性，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

本书适合作为高等学校通识教育教材，也可供社会读者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学国文/重庆大学《大学国文》编写组编；刘扬
主编.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9
ISBN 978-7-04-050442-2

I. ①大… II. ①重… ②刘… III. ①大学语文课—
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H19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95247 号

策划编辑 刘自挥 张晶晶 **责任编辑** 朱争争 **封面设计** 张文豪 **责任印制** 高忠富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http://www.hep.com.cn
邮政编码	100120		http://www.hep.com.cn/shanghai
印 刷	江苏德埔印务有限公司	网上订购	http://www.hepmall.com.cn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http://www.hepmall.com
印 张	16.5		http://www.hepmall.cn
字 数	34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定 价	38.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50442-00

2013年1月我从台湾淡江大学退休,刚好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邀请我去讲一个学期的杜甫诗,我很高兴就同意了。以前我在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上过几年杜甫诗,现在有机会重讲,当然非常乐意。我到高研院以后,有一次开院务会议,甘阳先生要我也列席。那一次会议主要讨论“大学国文”这一门课应如何开设。院里原定将要负责这门课的几位老师提出来的构想比较接近中国历代诗文名作精选课,甘阳认为这样的想法意义不大。甘阳是点子很多的人,他说这门课既要讲作品,同时也要讲中国文化,而且最好能从作品的选读中了解中国文化的发展。其他老师听到甘阳的意见,都面有难色,大家都认为构想虽然很好,但难度太大。

这门课台湾的大学也都开了,不过我们的课名叫“大一国文”,我上大学时就上过,我刚在大学教书时,也教过十几年。台湾的大学生都把这门课称为“高四国文”,他们认为高中已经读了三年国文,大学还要读,实在是多余,很少人对这一课程有兴趣。我们以前在大学读书时,对这一课程也很有意见。等我自己教这门课,我只能在教法上想办法吸引学生,其实按我们年轻一辈(当时我们都是三十岁左右)的看法,这门课是应该废除的。但这根本做不到,因为这是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规定的必修课。后来我跟几位朋友有机会决定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的系务,我们就决心要改革这一门课。我们提出构想,呈到教务处去。台湾清华大学的学风是比较自由的,我们的想法学校很支持,我们也就立即实行。不过,凭良心讲,这一改革在后来的施行中也并不理想。

20世纪90年代,“台独”思想开始在台湾盛行,李登辉“改革教育”时,有不少“去中国化”的做法,大一国文这门课越来越不受重视,很多理工科系甚至主张废除。还好社会舆论并不赞成,最后所有大学都把这门课的授课时数减半。这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大学国文的重要性。我常常想,如果我有机会重开这门课,应该要如何教。我心中的想法其实和甘阳很类似,因此,当甘阳问我意见时,我一时冲动,就说,如果能把这门课延后半年实施,我愿意按甘阳的想法试教看看。甘阳和当时高研院的吴书记(现已退休)都很高兴,立刻抓住我不放,我想后悔都来不及。

吴书记对这门课的开设真是尽心尽力,他努力为我解决在重庆的生活需求,又告诉我,我讲课的时候,原定要上大学国文的几位老师都要来听我的课。当我讲了半年之后,他们一方面还要听我下半年的课,另一方面又要在别的系开这门课,把前半年听过的课自己试教一次。我第一次体会到重庆大学的办事效率,在我看起来似乎很困难的事,却办得井井有条。

由一位比较年长的教师讲课,听众除了学生之外,还包括一些年轻的教师,年轻的教师按年长教师的课程设计再去上课,老实讲,这样的协作方式我有一点不习惯,因为我不认为我有这种资格。但是,我也理解,如果想设计一门理想中的课程,让这个课程具有明确的目的,似乎也不能不这样做。我告诉自己,我们正在试验一门课程,我和这些年轻老师必须紧密合作,希望能达到甘阳理想中的“大学国文”的教学目标。这只是个起点,一切都必须在将来的实践中不断修正,什么时候能够达到完美,谁也不知道,但总要有人尝试。

刚开始的时候,我非常忙碌,又非常紧张。我有三十五年以上的大学教学经验,但那是在台湾,现在我必须改变我的备课和教学方式。我要在每学期上课之前两周把整个学期的课程设计和讲义编好,在每次上课之前五天要把每一讲的纲要编好,而且要做成PPT。我不会用计算机打字,打字工作由我太太负责,但我太太不会做PPT,年轻老师中的袁敏老师跟我住同一栋公寓,她很热心地帮我做每一讲的PPT。学校特别请了一位录像师傅,把每一堂课都录制下来。每一位年轻老师上课时,可以根据我们编的PPT和授课录像,弹性调整,这样,整套课程既有统一性,又能表现每位老师的个性。我当了一辈子的老师,从来没有这么辛苦过,但我觉得很有价值,我也由此了解到,只有大陆的体制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一门课程的设计与教学试验,这种做法在台湾很难做得到。

教了一个学期后,有几位年轻老师到别的系去上我上过的课,我曾经到两位老师的班上试听,学校也安排几位教学督导老师到各班去听课。几周之后吴书记跟我讲,听课的督导老先生们都表示满意,各班的上课内容有相当的一致性,我听了很高兴,也很安慰,觉得我的辛苦很值得。

重庆大学希望我能再留一年,把这个课程改进得更完美。但我退休后已在大陆连续待了两年,我母亲高龄九十,我虽然也很想把这门课做得更好,但还是必须回台湾照顾老母亲。

2015年1月我回到台湾,不久母亲已无法自己行动,我必须陪在她旁边,同时我还要负责《陈映真全集》的编印工作,忙得不得了。有时候也怀念起在重庆大学的那一段日子,怀念跟我密切合作的年轻老师,而且也始终记得吴书记以及几位尽心尽力支援我的行政人员,虽然我不能长期离开台湾,无法再到重庆大学看看这门“大学国文”这几年来的教学状况,但我还是惦念着这门课。

今年三月我突然接到袁敏老师的信,她说,大学国文课程组的老师,参考我的实际教学和教学纲要,快要完成一本大学国文的教材,而且已经约好了出版社,课程组希望我为这个教材写一篇序,我当然义不容辞。五月,我收到了教材的全稿。在短短一个月内,我不可能从头到尾仔细读一遍,只能粗略地把每章的内容都了解了一下。这样,我就比较清楚地知道了我那一年的试验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我自己最满意的是第一讲“考古中国”。这一设想也是甘阳提出来的,非常好,我

立刻欣然接受。我以前花了不少时间了解新中国的考古成就,现在刚好派上用场。我的设想是:拿中华文明来和希腊文明比较。希腊文明并不仅限于希腊半岛,还散布在地中海和黑海各处的海岸边,都是小小的城邦,这是希腊无法统一的原因;而作为中华文明核心区的黄河中游,却是一整片广袤的黄土高原。在这种对比下,就可以看出中华文明的基础是非常广大的农业区,世界上其他的古文明都没有这么大的农业区。其次,我想强调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绵延性。我读过苏秉琦的《中华文明起源新探》,受到很大的启发。以前我们都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中原地区,然后再扩展到四周。苏秉琦根据新中国的考古发现,注意到中国各地都有许多新石器文明,刚开始时这些新石器文明很难分出高下,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黄河中游因为处于各种新石器文明的中心点,便于吸收各处文明的优点,所以发展得特别好,才形成中华文明的基础。这也就是说,中华文明成形的时候就具有广大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再加上广袤的黄土高原的农业区,就使得中华文明具有很强的生存能力,因此,当外来因素(主要是游牧部落)进入时,就容易被吸收进来。原有的面貌既得以保存,新的文化因素又使得它更为丰富。这样,就形成了经久不绝的绵延性。

我自己希望第一讲能够起到统摄作用,让以后的各讲都围绕着这个中心来展开。譬如讲到《诗经》,我特别强调《诗经》所呈现的周代农业文明的特质,这只要拿希腊诗人赫西阿德《工作与时日》所描写的希腊农业来对比,就很清楚。又譬如《左传》所描写的列国关系,只要拿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呈现的希腊城邦内战来比较,就可以看出,希腊城邦的内战只能一直打下去,直到大家都耗尽能量为止,而春秋列国之间虽然有许多战争,但大家基本上有一个“尊王”的愿望。到了战国时代,七个大国都想当王,战争规模越来越大,越打越激烈,这个时候先秦诸子的思想开始产生了“大一统”的观念,这跟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始终以城邦为出发点来建构政治理论有极大的差异。秦汉完成大一统后,司马迁的《史记》就以“大一统”的观念来书写从古代到汉代的中国的历史。《史记》不但是一本伟大的文学书籍和历史书籍,更重要的是它让“大一统”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在中国大一统形成史中具有非比寻常的作用。

汉帝国的瓦解一向被拿来和罗马帝国的崩溃相比较,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时间上相当接近。但罗马帝国消失以后,欧洲地区就再也没出现过“大一统”的帝国了,而中国在游牧民族大量涌进中原地区,分裂了三百年以后,却又重新统一为唐帝国。唐帝国的形态和汉帝国有很大的区别,但我们不能说,唐文明和汉文明是不同的文明,它们还是中华文明的两个阶段。“五胡”大量进入华北地区,但华北并未发展出另一种文明;“五胡”后来全部汉化,为中华文明带来新的因素。印度的佛教也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但佛教并未像有些外国学者所说的“征服”了中国,佛教后来也“中国化”了,和儒学及道教“和平相处”,中华文明又多了佛教这一新的因素。在华北地区陷入混战时,大批北方汉族逃到南方,他们努力开发南方,让南方的农业区得以扩大。因此,重新统一的唐帝国,就比解体前的汉帝国更为“巨大”。每一次分裂之后的再统一,都让中华

文明成长得更为壮硕。这种情形,在后来元代、清代两次的再统一中更是明显。因为唐代、元代、清代,在统一的过程中,主要的军事力量是塞外民族,所以很多外国学者会迷惑不已:这些都是中国吗?但是,从文明形态上来看,我们能说汉、唐、元、明、清是五种文明吗?所以,要讲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的文学与思想,就应该把从分裂到再统一作为讲述的主轴。这是秦汉大一统之后,中华文明第一次的“再扩大”,一定要讲清楚。这样,以后再讲元、明、清三代时,就比较容易。

我自己认为,在讲《诗经》到《史记》这一段,自己比较满意,从汉魏到隋唐这一段,只能说“差强人意”。宋、辽/金、西夏,同时并存,不是大一统,元、明、清是三种大一统形态,对这一长段历史我并没有了解得很透彻,应该说没有能力讲述,而且最后剩下的课时也很有限,有一点草草结束的味道,并不怎么精彩。

撰写这一教材的共有十二位老师,其中七位听过我的课,五位没有。我相信他们一定彼此讨论过如何把先秦至清代的文学作品纳入中国文化发展的大架构之中。他们都比我年轻得多,学有专精,因此没有选择我那种企图心太大的放言高论的方式来撰稿,完全可以理解。他们的安排非常巧妙,很让我佩服。

我要特别感谢为第一章撰稿的刘扬老师,他几乎完全遵照我拟定的纲要,保留我选用的地图和制作的图表。从具体文字来看,刘扬老师甚至从录像中记录下我上课中讲的一些话。当然,他自己也从别处增加资料和地图。我不能说,他只是整理者,当然更不能说,他所写的就是我想写的,不过,这一章把我的基本想法大致都保留了下来,应当是没有问题的,这一章刚好是我自己最满意的,能以这种方式让我间接参与了这个教材,我感到很荣幸。

下面我想简单谈一下本书其他各章安排的巧妙之处,有些地方稍微加以补充。先秦两汉部分共有三章,即第二章到第四章。第二章讲《诗经》和《楚辞》,第三章讲先秦诸子,第四章讲《左传》和《史记》,简单明了,重点选择得非常好。尤其是第四章,把记录春秋列国的《左传》,和表现大一统格局的《史记》相并列,真是神来之笔。关于第二章我想补充一点意见。相对于中原而言,楚国不只是南国,在春秋时,楚国还被中原诸国视为化外的“蛮”,管仲辅佐齐桓公,实行“尊王攘夷”政策,他们所要“攘”的“夷”,主要就是指楚国。甚至到了战国中叶,孟子还说楚人“南蛮鴟舌”。但是,到了战国末期,楚国竟然出现了屈原这一位伟大的诗人,这恰好证明,楚国已经和中原合为一体了,所以《诗经》和《楚辞》后来并列为中国诗歌的两大经典。我们还容易忘记,大一统之后所建立的一个伟大的朝代,汉朝,就是楚人刘邦建立的,而推翻秦朝贡献最大的陈胜和项羽也都是楚人。楚地融入中华文明核心区的过程,是中华文明融合力量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

魏晋南北朝是大分裂的时代,又比较缺乏大家公认的经典和大作家,很不好组织。本书第五章至第七章着重表现三个重点:五言诗成熟的时代——从《古诗十九首》到陶渊明;门阀士族的生活样态与文化风尚——以《世说新语》为核心;南北方文化的差

异、交流与融合。重点选择得非常准确而精当。这一部分最容易让我们看到从文化视野来统摄文学作品的重要性,这样,大学国文才不会沦为作品选读。

第八章讲李白、杜甫,第九章讲古文运动,都是必然的选择。我自己上课时也只讲李白、杜甫,现在突然想到,应该加进王维。李白具有异外色彩,又是道教徒,杜甫纯属儒家,王维则笃信佛教,三家都讲,可以看出盛唐文化的丰富与多样,同时也可以谈到佛教对中华文明的影响。至于古文运动,其实是儒学复兴运动的一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以后,儒学式微,道教、佛教影响更大。隋、唐再度大一统后,重建社会伦理秩序的首要之务在于重建儒学,这一工作直到宋代才由理学家完成。进一步讲,唐代的重建儒学,是对先秦两汉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发扬,可以让我们清楚看到,中华文明自先秦至唐代是一路发展下来的。讲古文运动,需要把这一背景交代得更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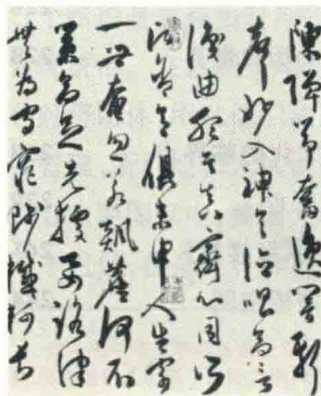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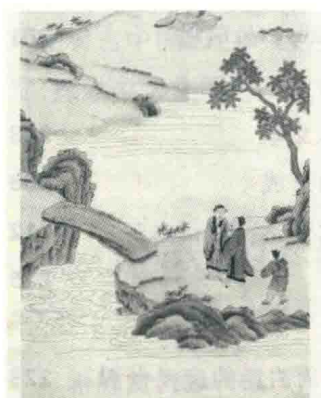
我前面已经说过,要如何把宋以后的文学和宋以后文化形态联系起来,我目前还没有想得很清楚。本书最后四章以庶民文学作为选讲重点,是现在一般都能接受的处理方式,我觉得也很恰当。庶民文学的兴起和宋以后的社会形态有密切关系。自魏晋以来形成的门阀士族,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已经完全消失。宋代以后科举成为仕宦唯一重要的途径,任何平民都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而成为士大夫,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阶级流动。因此,宋以后的士大夫和平民的距离并不像唐以前那么大。所以,词这一新兴的文学形式同时具有庶民和士大夫的精神内涵,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但是,关于戏曲和小说的兴起,我们该如何解释呢?这两种文学形式,在宋代都已萌芽,但在金、元两代发展得更好,也许和女真人、蒙古人、色目人大量进入中原地区有关系。这些人要学好士大夫所使用的典雅汉语是很不容易的,他们反而更容易接受以口语为基础的汉族民间文学。也许是由于他们的热爱,才助长了金、元杂剧和元代小说的兴盛。因为史料的不足,我们很难证明这一点。但清兵进关以后,北京旗人对于小说和各种曲艺的热爱却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他们还为此作出很多贡献,这也是大家都承认的。我前几年突然想到这一点,因此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甘阳在为重庆大学设计大学国文课程时,目标是想把作品选读统摄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视野之下。我试讲过一次,现在十二位老师参考我的设计,根据他们的专长重新调整,并且写出教材,可以说是这一理想的初步实现。本书各章的具体编写人员为:第一章 刘扬;第二章、第四章 吴娇;第三章 刘书刚;第五章 袁敏;第六章 万曼璐;第七章 李广益;第八章 彭磊;第九章 钱锋;第十章 彭文良;第十一章 金浪;第十二章 张华;第十三章 廖涵。我相信,他们会在未来的教学中逐步调整,所以未来再出修订本是很可预期的。祝愿十二位老师再接再厉,让这一课程更臻完美。

吕正惠

2018年8月

目 录



第一章 考古中国：文明起源的地缘因素	1
第一节 地缘视界中的古希腊海洋贸易文明	1
第二节 文化地理学中的华夏内陆农耕文明	7
第二章 文明伊始的中原与南国：《诗经》与《楚辞》	19
第一节 周人的文化精神与记忆：《诗经》	20
第二节 楚人的神仙世界与家国情怀：《楚辞》	28
第三章 诸子文章：秦汉一统前的思想世界	33
第一节 礼乐文明的阐释与重建：孔子、孟子	34
第二节 官僚政治的理论探索：荀子、韩非子	47
第三节 清静无为的自然之道：老子、庄子	57
第四章 从分封制到大一统：《左传》与《史记》	66
第一节 分封制的崩溃与诸侯争霸：《左传》	67
第二节 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与发展：《史记》	72
第五章 生命意识：从《古诗十九首》、建安风骨到魏晋风度	83
第一节 真率自然的《古诗十九首》	84
第二节 慷慨悲凉的建设风骨	88
第三节 潇洒旷达的魏晋风度	92
第六章 王谢风流：门阀士族及其文学	100
第一节 “王与马，共天下”：魏晋门阀政治	101
第二节 华堂流水金玉珍：士族庄园与奢靡世态、雅集风习	105
第三节 传家何物，多书插架：魏晋士族的文化特征	111



第七章 酬唱南北：文化的差异、交流与融合	116
第一节 民歌中的南音北调	117
第二节 士人笔下的南北意象	123
第八章 盛世高歌与乱离悲吟：李白与杜甫诗歌	135
第一节 飞扬跋扈为谁雄：李白	135
第二节 艰难苦恨繁霜鬓：杜甫	145
第九章 文以载道：政治波澜中的古文运动	158
第一节 贞元朝士已无多：从韩愈到柳宗元	158
第二节 文章太守两悠悠：欧阳修与北宋的古文运动	169
第十章 音乐与文学的新结合：唐宋词	178
第一节 兴起于民间的音乐文学	179
第二节 文人与词的初次结合	183
第三节 词与宋初的社会生活	188
第四节 北宋中后期词作中的士大夫情怀	193
第五节 南宋词作中的家国情怀与英雄气概	201
第十一章 庶民社会的兴起及其文学	208
第一节 唐宋变革与庶民社会的形成	208
第二节 庶民社会的文学形式：“说话”与“话本”	212
第三节 《水浒传》中的庶民世界	215
第十二章 《窦娥冤》：蒙古人统治时期的庶民世界	223
第一节 一统而多元：元朝的历史独特性	223
第二节 源远流而庞杂：元曲的特征	226
第三节 冲突与融合：《窦娥冤》的历史世界	228
第十三章 《红楼梦》：中国传统文化的临界点	238
第一节 晚明的个性解放与国家兴亡	239
第二节 世情小说：从《金瓶梅》到《红楼梦》	241
第三节 礼教危机：《红楼梦》的情感空间	244

第一章 考古中国：文明起源的地缘因素

文明形态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样态，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如果要对文明形态进行分类，单从地缘位置来考察，可以分为内陆农耕文明和海洋贸易文明两大类别。法国学者 H.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强调环境因素对于文化艺术的影响，特别是地理因素，如河流、山地、气候等不同的因素对于文化起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以考古的视角来考察发轫于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华文明，不难判断地缘位置则是影响这支原生文明起源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样，作为欧洲文化源头的“二希”文明之一的古希腊文明，它的起源与发展同样受到地理位置因素的影响。经久历年，前者衍生出农耕文明，后者发展了海洋文明。^①本章在将古中国和古希腊为代表的东西文明进行比照的大视野下，从地缘因素的路径出发，探索中华文明与文化的起源和发展。

第一节 地缘视界中的古希腊海洋贸易文明

希腊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在 1829 年。这之前的希腊历史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独立的城邦时期，在希腊半岛上前后相继出现了一百多个城邦国家；第二个阶段是被统治时期，先后被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在近两千年的被统治历史里，由于希腊人没有组织过全国性质的政治组织和经济团体，所以他们缺乏政治意识和财务经验。但希腊人最丰富的政治经验则是城邦管理，所以他们无法设想东方的中国怎么会拥有如此庞大的政治组织。其实在现代西方主要国家中，美国人口大概两亿，德国和法国人口都不足一亿，而中国人口却超过了十三亿，在全世界唯有印度能和我们一样拥有如此庞大的人口体量，在历史上和现

^① 将中华文明与古希腊文明作对比，是因为中华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以及古印度文明都属于大河文明，而古希腊文明属于海洋文明（黑格尔《历史哲学》），两种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更具有来自地理因素的可比性。

实中,西方国家都没有管理过这样人口数量庞大的国家的经验。所以,希腊实际上除了成为自治分散的城邦国家之外,就是强国的殖民附属地,直至1829年在西方的援助之下,才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控制下脱离出来成为独立国家。希腊没有走上政治轨道的原因可归结为两个基本因素,第一是没有政治意识和实践经验;第二是他们的政治、军事、外交前后受到德国、法国或者英国的控制,从未独立运作,因此希腊的历史身份其实不是独立国家,而只是西方列强的附庸国。但是希腊城邦时期却是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极为繁盛的时代,为人类文明和世界文化作出过重要贡献。黑格尔曾经不无倨傲地认为,世界文明起源于西方,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尽管这种理解失于偏颇,但从中也可一窥古希腊文明之重要性。作为世界文明中的一支的欧洲文明的确起源于古希腊和古希伯来,尤其是古希腊辉煌灿烂的文明留给后世以民主价值与科学理性。正如马克思所言,欧洲后来的文化与文明都是它的注脚。其中,地理环境对古希腊文明与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广泛地反映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社会礼俗和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

古希腊地区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半岛西岸,扼欧、亚、非三洲的交通要冲。

古希腊半岛大部分是山地地形,适宜农耕的土地较少。三面临海,东有爱琴海,西有爱奥尼亚海和亚得里亚海(它们都是北地中海的一部分)。其中爱琴海处于地中海东部的西北隅,东接小亚细亚,西连希腊半岛,南与埃及、叙利亚隔海相望,海中岛屿星罗棋布,有利于航海和文化交流,因此,古代希腊实际上是被诸海域环绕的半岛。在这里,常年温润晴朗的地中海气候表现得最为典型,没有北部欧洲大陆冬季的严寒,也没有南部非洲夏日的酷暑。地理环境造就了古希腊独特的文明,其中最为杰出的就是爱琴文明,在历史传统上,爱琴海与希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自爱琴文明形成后,爱琴海与希腊组成统一文化区,即世界历史上著名的古希腊文化区。三面环海的古希腊,岛屿众多,海岸线曲折,海峡连绵,加之人多地少,唯一适于种植的土地分布在环沿海的狭小地带,受地理自然条件的限制难以从事大规模农业生产。为了解决人们的土地和生存问题,古希腊人往往凭借海洋优势从事海上贸易活动和向海外进行扩张。公元前8世纪到前6世纪是殖民运动的高潮时期,即大希腊化时代,数以千计的殖民城邦遍布整个地中海和黑海沿岸,构成了多中心的古希腊世界。

局促的地域环境迫使古希腊的主要经济形态天然地选择以航海贸易为主。90%的古希腊人住在沿海平原上,距离海岸不到一天的路程,那么他们如何出行呢?出海则是最经济有效的途径。因为如果将货物往内陆运送75英里,比将货物从地中海的一端运往另一端花费更大,所以,古希腊谚语说:“陆地把世界分开,海洋把世界连在一起。”这奠定了古希腊人意识中以海洋思维来认知和叙述世界的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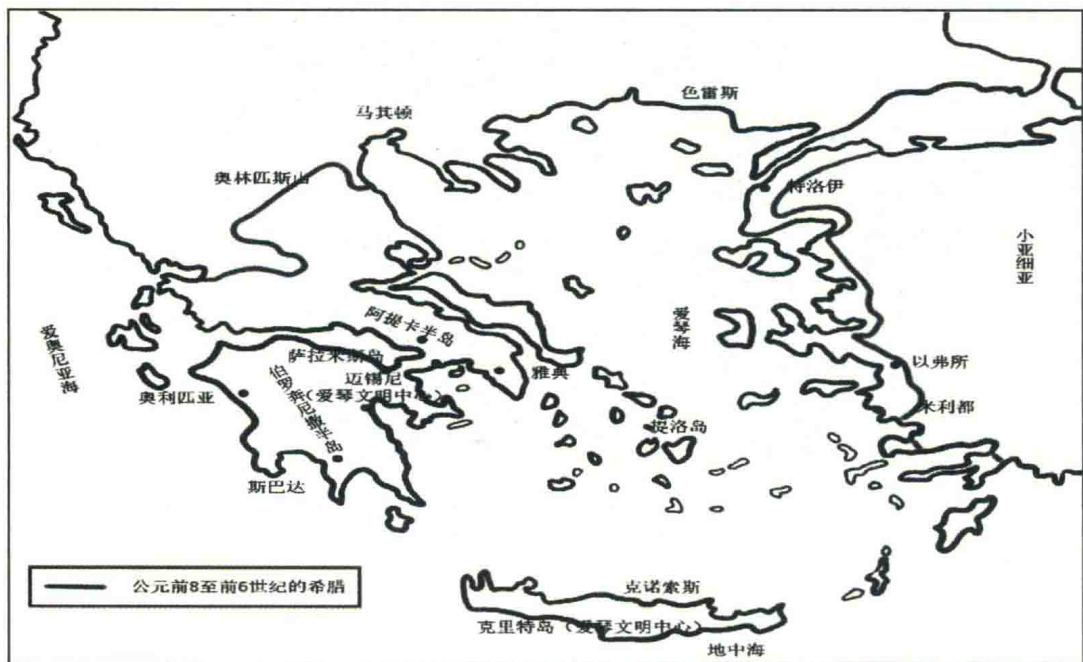


古希腊城邦(公元前 8—前 6 世纪)

在希腊半岛东部,由于海浪的长期冲刷,形成了一条弯弯曲曲呈锯齿状的海岸线,特别是在阿提卡半岛附近,以及西部科林斯地峡和东北部的攸卑亚大岛一带更为得天独厚,加上爱琴海上星罗棋布的众多岛屿,这一切都为当地居民的海洋航行提供了天然的优越条件。此外,古希腊地区盛产橄榄油、葡萄酒以及陶器,这又为海外贸易提供了商品。当这一切必要条件都具备之后,整个地中海就成了古希腊人自由翱翔的天堂。向东,古希腊人从半岛出发,可通达小亚细亚,穿过今天的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可进入黑海海域;向南,经由克里特岛可抵达埃及;向西,横渡爱奥尼亚海可穿越意大利和西西里岛。地域的扩充不仅解决了古希腊人的土地问题,而且还促进了古希腊各地的商品生产和海外贸易。总之,大范围的和常态化的贸易促进了古希腊经济的繁荣昌盛。

首先,希腊在古代不是一个国家的名称,而是希腊人对他们生活地区的统称,它的地理范围包括今天的希腊半岛的一部分、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半岛西岸。如前述,古希腊政治制度上的特点是城邦制度。城邦是指一种国家存在的形态,它一般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包括周边的村社。公元前 8 世纪到前 6 世纪,古希腊城邦逐渐形成,其主要特征是小国寡民,各邦国长期独立自主。在历史的发展和演进过程中,辉煌的古希腊文明却始终未能从这种小国寡民的城邦发展成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王朝或帝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古希腊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使然。希腊半岛上众多的深山峡谷形成的天然屏障造成了彼此地理上的分裂,层峦叠嶂的地势将陆地分割成若干小块,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众多彼此较为隔绝的小城邦。而这样的城邦,因为地小人少,就能充分地鼓励和调动城邦公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使得城邦的自治权利或多

或少地属于公民,有利于古希腊城邦的政治权利下移,为民主政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条件。(见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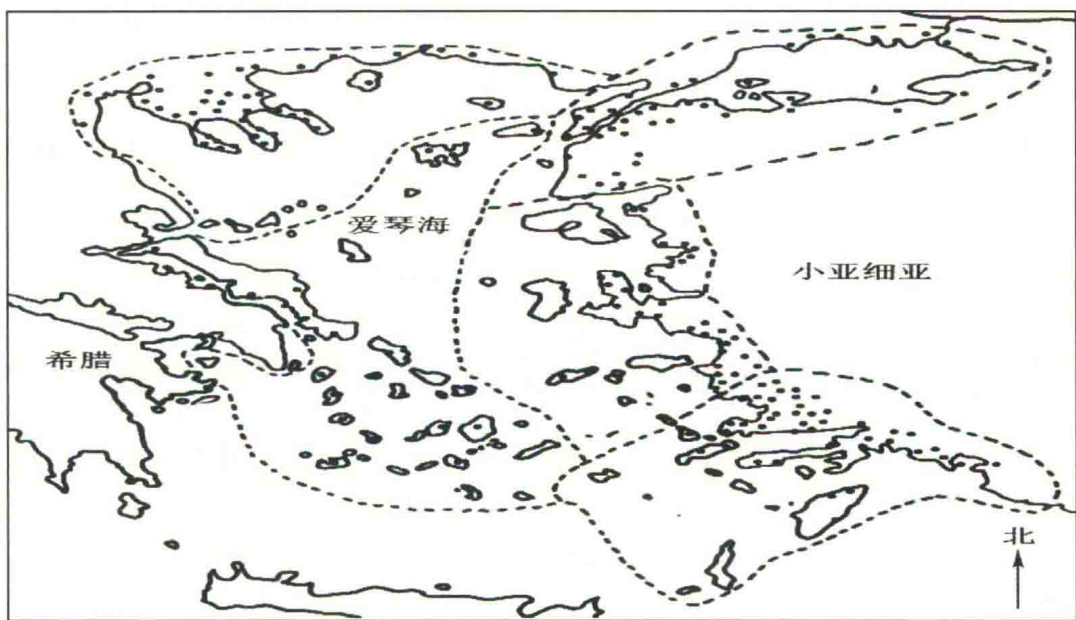


古代希腊地区

其次,独特的自然环境导致古希腊多种经济形态并存,生产和生活的方式多样,航海交通和商业贸易的发展,使得古希腊难以形成统一的君主集权制国家。相反,由于航海业和殖民扩张的兴起,导致大量人口的频繁扩散和迁入,这种人口和种族的交往流动,侵蚀、瓦解了古希腊的血缘亲族组织。在进入阶级社会后,政权、神权、财权的分立格局又消解了“一元化”的族权,地缘战胜了血缘,私有制代替了原始血族的公有制,形成了以崇尚“个体利益”为导向的文化渊源,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发展,甚至近代西方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也都源于古希腊。

最后,古希腊半岛自身不产粮食,它必须从盛产粮食的素有米仓之称的乌克兰黑海地区运过来,并且把陶艺、橄榄油、葡萄酒等特产运过去,通过海上互贸促进经济的发展。所以需要以雅典为代表的海洋帝国建立一支海上同盟,出动海军控制整个以爱琴海为中心的海上航线,保护这条粮食贸易生命线的安全。也就是说,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城邦其实是一个海洋帝国,而且是以海岸国家和海岛国家组织起来而形成的海洋联盟。

雅典帝国将海洋范围分为一区、二区、三区、四区、五区,在最强盛的时候装备了五支舰队,不断地巡航它的势力海域,然后向各个加盟国家收取佣金,如果加盟国家不缴佣金就会受到打击。希腊把财富全部集中在雅典,雅典用这些财富组建当时



古代希腊海洋范围

地中海世界最强大的海军,使得隔海遥望的波斯帝国也只能望洋却步,因为波斯是一个陆地称雄的帝国而不是一个海上称霸的国家。所以在随后的多次希波战争中,完全没有海军力量的波斯帝国始终处于海战弱势。最后,只能通过支持斯巴达建立海军来对抗和瓦解雅典同盟。政治区域的松散化和条块化,使希腊无法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长期为周边的大帝国所统治。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连续统治了希腊近两千年,直到1829年希腊才真正独立。

古希腊文化的起源、发展与繁荣也与大希腊化时代的移民有关。居住在古希腊半岛的主要人种是斯巴达人和雅典人,而在他们北面是欧洲内陆的马其顿人和色雷斯人,西面是濒临爱奥尼亚海的爱奥尼亚人,南面是隔海相望的克里特人和迦太基人,东面是居住在小亚细亚的以米利都人为代表的波斯人。由于雅典和斯巴达逐渐成为主要的城邦国家,散居各地的人们不断地汇集于此,于是导致人口剧增,由于古希腊平原稀少,土地贫瘠,粮食生产不能自给,于是开始了一场移民运动。古希腊移民遍布地中海沿岸,先是围绕爱琴海沿岸,然后北往黑海沿岸,西往北非、西西里岛、意大利南部,以及西班牙东部、法国南部少数海岸。(见下图)

同时,这也要求希腊人只能通过商业贸易维系生存和发展。在古代,航海技术并不发达,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也有限,但古希腊人积极适应海洋,在长期的海上贸易和殖民活动中,古希腊人养成了勇于探索、积极进取的精神。同时,商业航海贸易要想得以顺利进行,必须遵守公平这一首要的交换原则。商业贸易的发展在本质上要求自由的环境,以及顾及商业贸易者双方的整体利益,否则商业贸易便不可



古希腊的移民活动

能顺利进行。而这一切都有助于古希腊的平等互利和民主自由思想的形成,也为古希腊的民主政治的产生和形成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古希腊航海贸易业的发展,不但加强了希腊地区与整个地中海世界的物资交换和贸易往来,还使古希腊人打开了眼界,从东方吸收字母文字、建筑、雕刻、冶金、铸币等先进文化成果,为自己独特的文明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在历史、哲学、建筑学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谱写了璀璨的古希腊文明。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古希腊人利用希腊半岛北面背山、三面环海、山多地少、直面大海的独特地理环境,创造了深蓝色的海洋文明。正如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所说,“地理并不创造技艺和习俗,它只是给你机会或是不给你机会”。^②幸运的是,古希腊人抓住了这样一种难得的历史机遇,使天赐的独特地理环境成为供给古希腊文明大厦的砖瓦石灰。于是,在古希腊的土地上,出现了繁荣的商品经济,健全的民主政治,积极开拓、锐意进取的民族精神,使古希腊人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并成为近代西方文明的摇篮,甚至是世界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可见,地理因素在国家或者地区的文化起源和历史发展中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

② [美] 罗伯特·路威:《文明与野蛮》,吕叔湘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9页。

第二节 文化地理学中的华夏内陆农耕文明

当我们把视野转向亚洲大陆最东端的华夏民族时,不难发现这是一个有别于古希腊的文化地理环境。黑格尔说:“我们所注重的,并不是要把各族所占据的土地当作一种外界的土地,而是要知道这地方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性格正是各民族在世界上出现和发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采取的地位。”^①华夏文明与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以及文明形态的选择同样受到地理因素的影响。

第一,幅员辽阔,腹地纵深。中国位于东亚大陆,与希腊被海洋分割成小块状相反,这里是一片连绵不绝的广阔土地,核心地带是由黄河、长江两大河系及许多支流贯穿的高原、平原、丘陵地带,适合发展农业。早在公元前四五千年的仰韶文化时期,我们的祖先便开始在这块纵横5 000余千米,其面积几乎相当于整个欧洲的东亚大陆上从东西南北中各个不同的区域进行艰难的开拓,创造了丰硕的文明果实。至少到公元前1 000多年的周代,便已形成了“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尚书·禹贡》)的庞大帝国。这里江河纵横,土地肥沃,物种繁多,有着丰饶的生存资源和广阔的回旋天地。境内流域面积在1 000平方千米以上的河流就有1 580条,流域面积超过1万平方千米的河流有79条,其中仅长江、黄河、黑龙江、珠江等几大水系的流域面积总和就达数百万平方千米。可见,依山傍海的古希腊文明发祥地难以与之相比。而这辽阔的土地不但为我们的祖先提供了完全自足的生存条件,而且蕴藏着雄厚的发展潜能。在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曾经遭受过多次外族的入侵,而终究能保持文化的延续与完整,未曾像其他古老文明那样遭到毁灭或中断,正是有赖于这不可多得的广阔内陆基地。

第二,地形复杂,封闭自守。中国的北面,包括新疆、外蒙古在内的区域是戈壁沙漠,西北是昆仑山,西部是青藏高原,西南是云贵高原,从西南到西面到北部,高原矗立、群山横亘,而中东南部海拔较低,以矮丘平原为主,整个地势是西北内陆向东南沿海倾斜,可见中国相对是一个比较孤立和封闭的地形。以这样的地形地貌,外来文化不容易传播进来,所以古中国人可以独立自主发展自己的文明。四大文明古国中,相对于东亚边陲的中华文明而言,埃及和巴比伦文明位于西亚,易于传播和互动,因为他们均以平原为主且靠大河维系,且相距较近,今天的考古也证明两河文明和古印度文明之间是通过波斯湾海路来交往的。(见下图)

^①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23页。